

試論文字學研究的新方向

李 孝 定

自東漢許慎撰成《說文解字》，開創了我國文字學研究的先河，下迄清乾、嘉時代，說文學大盛，研究金文者，也風起雲湧，降及晚清，殷商甲骨文字大量出土，研究者取前代說文之學和金文研究的成果，合冶於一爐，我國文字學研究，大放異彩，可謂前無古人。自許慎以下，兩千年間，研究文字學者，幾乎全都師法許氏，從微觀的角度，靜態的分析每一個漢字的偏旁結構，對甲骨文、金文、小篆的判讀解釋，大抵已臻美備；時至今日，研究文字學者，如仍循此故轍，實已沒有太大的發展空間。筆者，於1968年，想探討漢字的起源與演變這個課題，嘗試將前人微觀、靜態研究的成果，串連起來，用宏觀的角度，全面的觀察不同時代的文字資料，然後作動態的、系統的描述，二十多年來，撰成若干篇專論，集結成《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這本小冊子。本文之作，即將各文的撰寫和思考過程，作一簡要的描述，這就是筆者對文字學研究，所採取的新方向，也可作為《論叢》一書的後序讀。

所謂文字學的新方向，實在仍是老問題，如此命題，近於譁眾取寵；不過對筆者而言，卻是近二十多年來，堅守不渝的研究方向，也撰寫了近二十篇論文，所討論的，都是文字學上的大問題，雖也有些收穫，但綆短汲深，許多問題，仍只是發其端緒，難有定論。二十多年，不是一段短時間，所為文雖已陸續發表，卻是散見各種刊物，蒐集不易，敝帚自珍，恐日久散失，爰於民國七十五年，商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同意，集結出版，題曰《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此文之作，應可作那本小冊子的後序讀，也可作筆者近二十多年研究的總報告看。

許慎《說文解字》的序言裡，提到他撰寫《說文》的大例，他說：「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明顯的標明了此書要將三種不同時代的文字資料——古文、籀文、篆文，合併加以討論；他又說明小篆的成因：「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

所謂小篆者也」，這說明了他對文字演變的了解和重視；他又說：「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這証明了許叔重對漢字地下資料的認知；他涉及許多文字資料，古文、籀文、小篆、鼎彝銘文，它們間的關係和各自的本來面目如何？他在序言中雖多所論列，但或詳或略，或明確，或含混，大抵有關籀文和小篆，所論多屬明確，古文一辭，在語意上，涉及不同範疇，多有含混，如他交待金文與古文的關係，即其一例；這些非本文所要討論的，從事文字學研究的人，大都心知其意，想辨析清楚，要費很多篇幅，姑略而不論，但許慎所見的古代文字資料，只限於殘存的史籀篇，和幾經傳寫的古文經，因之，他除了在序言裡作重點式的揭舉外，對文字的起源和演變，不能作深入而周延的探討。在正文裡，全部是文字結構的靜態分析，這種方法，一直支配中國文字學的研究，垂二千年，至今未替。許慎的另一種重大貢獻，是將全書所收集的九千餘字，找出字根，作為部首，分為五百四十部，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他用上述兩種方法——文字結構的靜態分析，文字全部資料的綜合觀察，然後分別部居，在當時，這已盡了文字學研究之能事，後世治文字學者，莫不奉為圭臬，不為無故。許氏所論，止於小篆，在當時已是古文字，小篆出於古籀大篆，或頗省改，其字形結構，於籀文為近，王國維《觀堂集林》〈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一文，論此甚為詳審。隸書實源於戰國時民間日用之簡牘俗字，有深厚的時代背景，漢興以後，民間日用，士林傳習的，已全是隸書的天下；《說文》白文中，很多字不見於正文，明顯可見說文白文，全是用隸書寫成的，獨恨他所敘，僅限於古、籀、篆，而不及隸書，不然，文字演變之學理與實証，早已大彰於當時，後世文字學之研究，亦將大大的改觀了。

晉興，初有楷書，歷經南北朝寫經及民間日用，繁變實多，梁顧野王著《玉篇》，鍾武《說文》，而部敘、部首損益、及說解頗異，說解不論字形，多收字義，部敘則並採《說文》、《爾雅》之長，所論以楷書為主，故部首頗有損益，已開近代文字學之先河。筆者認為我國古文字學之研究，至今已有豐碩成果，獨於現代文字之淆亂，少所究心，談文字改革者，又握苗助長，大量新造簡體字，甚或主張國語羅馬化，停用漢字，究其極，不盡毀數千年固有文化，不足以鑒其

意。竊謂治文字學者，實宜對《玉篇》一書，多所究心。奮起共圖中國現代文字學之建立，這實為文字學研究的新方向中，最為重要之工作。

筆者在幾年前，曾對《說文》和《玉篇》兩書部首，稍作研究，發現《玉篇》對《說文》540部首，刪去十一部，另增十三部，唯一的原因，是兩書據以研究的文字資料不同，一為小篆，一為楷書，所刪十一部，楷書已無此偏旁，不刪，則此十一部下，將無從屬字，且此十一個部首，楷書中也無其字，或雖有其字，而可另作歸屬；同理，所增十三部，其部首及從屬字，皆為楷書之新生字，易言之，《玉篇》所以增刪《說文》部首，純由因應字形演變之結果，就此一意義言，它實已為現代文字學之建立，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其次，《玉篇》之部敘，也大異於《說文》，它隱含了《爾雅》的體例，這代表了顧野王對文字分部的新觀念。其三：《玉篇》全書，不分析字形結構，而多收字義，這主要也是為了字形已改，僅就楷書之偏旁，難以窺見其初形朔義，這正是現代文字學研究之主要困難所在，顧氏乾脆加以迴避，嚴格的說，《玉篇》只是一本簡單的訓詁辭典，只有部首的增刪，確實涉及了現代文字學的主要領域，我們只要踵武他的後塵，對楷書字形，作進一步的爬梳剔抉，眾志成城，現代文字學之建立，雖非一蹴可幾，然必有終底於成之一日，這是文字學研究的新方向中，最艱鉅、也最關重要的一部分。筆者曾撰〈說文玉篇部首比較研究——漢字新分類方法初探〉一文，刊於《大陸雜誌》1985年7卷3期，全文對顧書增刪24部首，作了較多的討論，根據所論，擴及全書542部，應是切入現代文字學研究的可行辦法。全文提出了若干概念，但對楷書新分類方法，並未能提出具體可行的實例，因此沒收入拙著《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今後如健康許可，更重要的視力不更惡化，筆者真想賈其餘勇，在楷書分部方面，作一點發凡起例的工作。

唐代的字樣之學，大概取篆隸字形，作比較觀察，亦屬現代文字學之範疇；北宋二徐，纔開始對《說文》作深入的研究，釐定了《說文》的版本；元明兩代的文字學者，多偏重六書和文字分類的研究，已不限靜態之文字分析，漸趨文字資料的全面觀察。下迄遜清乾嘉時代，說文之學大興，名家輩出，皆踵武許君，對所收九千餘字，作靜態之研究分析，各家之精思卓識，珠玉紛陳，已可嘆為觀

止。今日治文字學，如仍守此故步，恐難有太多的發揮空間了。金文的研究，北宋已開其端，當時尚屬草創，著書立說者，雖不乏其人，而成果未臻豐碩；下迄乾嘉，因說文之學鼎盛，金文研究之風復興，成績遠邁宋人，漸漸地，說文學的著作中，引用金文資料者日多，到吳大澂著《說文古籀補》，對說文之學與金文之學，等量齊觀，在文字學研究的方法上，算是一大進步；《說文》中雖收了籀文，但那是殘存且經傳抄的二手資料，金文學家所用，係完整的第一手地下資料，二者合流後，研究者取精用宏，視野大開，不久，甲骨文資料日出，學術界將三者合冶一爐，不同時代之文字資料，幾已蒐羅齊備，較之許君所見，真不可同日而語，就文字學研究的資料說，這是一大突破。但近百年間，研究甲骨、金文者，在研究方法上，大致仍守靜態的、分析文字結構之故轍，對個別古文字資料之訓解，可說已臻美備，亦間有討論個別文字的歷史演變，但都是於說解文字時，偶一涉及，大抵一鱗半爪，鮮見從文字演變的觀點著書立說者。筆者認為，時至今日，對甲骨、金文、小篆三種不同時代的文字資料之研究，已甚成熟，吾人實應綜合各家之結論，從宏觀之角度，綜觀全部文字資料，作文字演變動態的探索，期能對文字學上各重要問題，跳脫孤立討論之界域，建立系統的描述。

一九六四年三、四月間，筆者受本所前輩、考古學家李濟先生之命，為《中國上古史稿》撰文，命題為〈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這應該是全部的中國文字學，受命之後，久久難以下筆。其時，拙編《甲骨文字集釋》成書未久，筆者對甲骨文資料，相當熟習，大家公認甲骨文字是最早的、已經成熟的漢字，要想探索我國文字的起源和演變，從分析和綜合甲骨文字的研究著手，應該是切入問題的正確方法。於是先著手就全部可以確定形、音、義的一千多個甲骨文字，作六書分析，分別取得若干數據，再進一步作綜合研究。採取這個步驟，主要有兩點理由：(1) 甲骨文是最早而且發展已臻成熟的漢字，而六書說，是直到東漢許慎纔完成的，晚出的文字學理論，它所根據的，只是小篆、和殘存且經過傳寫的籀文和古文，都較甲骨文為晚。以晚出的文字學理論——此一理論至今仍是中國文字學的主要骨幹，去分析研究較早的文字資料，希望能獲得若干具關鍵性的啓示。(2) 前代文字學家，早就用這種方法，分析研究了兩種不同時代的文字資料：

宋代的鄭樵，在《通志》〈六書略〉裡，用六書說的理論，分析了當時通行的兩萬多個楷書；清代的朱駿聲，在《說文通訓定聲》〈六書爻列〉裡，用同樣方法，分析了《說文》所收的全部九千多個小篆，雖然我們對六書說理論的了解，容或有少許差異，但這幾種工作，都是對各別時代的文字資料，作全面的觀察，分析每一個文字，然後綜合作結論，將這三種六書分析的結果，綜合觀察，用以對漢字的演變，作有系統的描述，應不失為一個可以信賴的方法。今年筆者又撰〈殷商甲骨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上的相對位置〉一文（史語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四分），以〈容庚金文編第四版所收字六書歸類字表〉為附錄，加上前述三種字表，對全部漢字演變趨勢的觀察，大體上可以說粗具輪廓了。關於上述(1)所稱，甲骨文的六書分析中，期盼能得到若干關鍵性的啓示一點，成果雖不能令人滿意，但也有一二值得一提的發現：甲骨文中假借字所佔百分比，遠較後世的文字為高。甲骨文所用假借字，到了晚期，有很大部分，加上了意符，成為形聲字。這顯示形聲造字的方法，是為了補救假借字的缺點，纔被啓發完成的。這也凸顯了因為漢語是單音節語的特性，假借字用多了，必然產生混淆，自然也就沒有走上拼音的道路，而必須用一形一聲的形聲字結構，來完美的配合漢語的特性。甲骨文中形聲字的百分比，居第二位，低於會意字，這說明了商代尚處於形聲字的發軔期，這以後，小篆、楷書中，形聲字的百分比，急遽上升，成為漢字的主流，也是漢字演變史上最值得注意的現象。甲骨文中，沒有發見任何兩個字，可以被解釋為轉注字，這同樣的透露了甲骨文在漢字發展史上的相對位置，轉注字是形聲造字法被大量用以製造新字後，為那些古今音殊、和方言音殊的語言，所造的區別字，假如要確切表達每一個人的語音，理論上，可以無限制的製造轉注字，但實際上，後世的轉注字，增加得極有限，三千多年前甲骨文中形聲字所用的聲符，至今未改，也不影響我們的辨認，這完全因為形聲字的完美結構，節制了漢字數量漫無限制的增加，也解除不同時空的人閱讀的困難。以上種種，都是〈從六書的觀點看甲骨文字〉拙文中，所得到的重要啓示。此外也還有些枝節性的問題，可以為研究漢字演變的一助，原文可以覆按，在此不必贅述。以上所談的漢字演變，係觀察每一時段漢字的全部資料後，綜合描述它們演變的大趨勢。此外，有關個別

文字的演變史，也是這種研究的重要部分，文字是人們所造用以表達語言的工具，但因為心同理同，約定俗成的結果，文字似乎變成了具有生命的有機體，它們之間，也具有或疏或密的血緣關係，我們稱這種現象為字族。關係較為疏遠的，像《說文》五百四十部中同一部首下的從屬字，它們與部首，都有或遠或近的關聯；至於較密切的，則往往如人類之有高曾祖考、子孫雲仍，我們只要細加查考，往往能窮其原委，觀其會通，對於文字之考定，常能提供莫大之助力。不過由於漢字源遠流長，孳乳寢多，演變過程中的若干環節，每每失落，演變的情況，又繁簡各殊，要想對每一個字，都作歷史的考証，殊非易事，筆者在《論叢》一書中，收〈釋釁與沫〉一文，可以舉一反三。

前段所述，主要是以甲骨文字的六書分析為基礎，取以與《六書爻列》、《六書略》，參互比較，作成對漢字演變大趨勢的總體描述。至於文字演變的細節，因資料過於龐雜，頭緒過於紛繁，非一文可以盡攝。至於文字的起源，前代文獻所載，大多鄰於想像，難以實證。甲骨文約出現在去今三千五百年前，是發展已臻成熟完美的文字，在那時之前，必然經過了漫長的發展演變的階段，可是除殷墟小屯外，別無發現，很難據以探索文字的起源。發現甲骨文的小屯殷墟遺址中，同時發現了一批陶器，上面刻劃了若干符號，總計八十二片，其中有五十個符號，和甲骨文全同，其餘不可識的，計有十五個。這些遺址，經過擾亂，不過大致還可以知道，這批陶器和甲骨文是同一時代的遺物，這啓示了我們，要探索文字的起源，從田野考古的遺物中去尋求，應是一個可以信賴的線索。那時恰好獲讀大陸出版的一本考古報告《西安半坡》，收錄了二十二個刻劃符號，當時全不可識，又從《城子崖》這本考古報告，和《河南偃師二里頭發掘簡報》中，各發現了少量的符號，連小屯陶文，共計四批。除了小屯陶文可以確定是文字外，其餘的要說是有意義的符號，還有待証明；不過，在不同時空出現的陶器刻符，雖然數量不多，但形式大半相同，而且重複出現的機率也很高，這使筆者相信它們必然代表某種相同的意義。據此了解，筆者在一九六九年，撰成〈從幾種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觀察蠡測中國文字的起源〉一文。其後，田野工作日盛，發現的陶器刻符也日多，又先後撰寫了〈再論史前陶文和漢字起源問題〉，和〈符號

與文字——三論史前陶文和漢字起源問題〉二文，所見材料日多，卻與〈蠡測〉一文所得結論，若合符契。這令筆者頗感欣慰，早年的蠡測，竟能言而有中，現在這種觀念，已被學術界所普遍接受了。

上述〈從六書觀點看甲骨文字〉、〈從幾種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觀察蠡測中國文字的起源〉二文撰成後，稍加剪裁，並補充了些晚出的金文、小篆的討論，合併而成〈中國文字的起源和演變〉一文，不僅向李濟先生主持的中國上古史編輯會交了卷，更重要的是，改變了筆者從事文字學研究的方向。在那之前，筆者從事文字學研究時，大抵不出於乾嘉以來前賢故轍，三百年間，學風鼎盛，甲骨出土後，研究者取與乾嘉以來金文、說文之學，參互稽考，成果豐碩，度越前代，後學者如不別闢蹊徑，已無發展空間。因思，倘取時賢研究之成果，就不同時代之古文字資料，作全面之觀察，系統之描述，著重其演變遞嬗之大趨勢，期能達成動態文字學之新貌，此一新方向，所以異於舊方向者，在一為微觀，一為宏觀；一為靜態之個別文字資料，一為動態之全部文字資料，而後者必以前者為基礎，方不至泛濫無歸，流於空論。

秉持此一原則，二十多年來，撰寫了近二十篇論文，大部分已收入《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一書中。如〈從六書的觀點看甲骨文字〉的撰述，係以《甲骨文字集釋》為基礎。〈從幾種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觀察蠡測中國文字的起源〉、〈再論史前陶文和漢字起源問題〉、〈符號與文字——三論史前陶文和漢字起源問題〉，這一系列討論漢字起源的文章，是綜合觀察了幾十批陶文資料，取與甲骨金文相對照，在不同時空所出資料中，有其形体相同、重複出現的機率相若等各項因素，據以作合理的詮釋，以證成其為漢字的原始雛形。〈從中國文字的結構和演變過程泛論漢字的整理〉一文，是針對早年簡體字問題的熱烈討論，所作持平的看法。〈從金文中的圖畫文字看漢字文字化過程〉一文，是筆者撰寫《金文詁林附錄集釋》一書後，歸納而成的幾條演變的規律。〈漢字起源的一元說和二元說〉一文（1983年香港中文大學《古文字論集初編》），是折衷時賢的論點，提出比較持平的看法。〈同形異字說平議〉一文（1989年東海學報第30卷），是用文字演變過程中，所衍生錯綜複雜的現象，解釋同形異字的成因。總之，這

都是採宏觀的角度，看有關的全部的文字資料，對每一現象，都儘可能找出它們的相關問題，絕不孤立討論，這與以前靜態文字學的研究方法，是大異其趣的。雖然因為筆者學識譾陋，許多問題，只提出了些新的觀念，而不能得到滿意的結論，還乞方家大雅，不吝垂教。

後記：一九四七年七月，筆者奉 孟真先師之命，去北平參加本所設在那兒的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工作，越一年又四個月，全部整理竣事，筆者請假返湘省母，其時，國事蝸蟬，烽煙四起，內戰方殷，不旋踵間，國軍土崩瓦解，京滬易幟，本所已自京遷臺，筆者困處窮鄉，徬徨無計。先師於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間，一月之內，連發四電，又寄親筆函一通，促筆者東渡，這纔加緊籌措旅費，從廣州取道海上，於是年六月抵臺。筆者世代都是地主，當年倘或滯留大陸，以易幟之始，及爾後文化大革命十年間，屠戮之慘，筆者必無倖理。是則有生之年，皆先師所賜，深恩厚德，感何可言！明年，恭逢先師百年冥誕，本所籌刊紀念論文集，謹撰蕪文，不敢計工拙，也明知不足以言學術，敬誌追慕之私而已。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李 孝 定 謹誌

（本文於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十六日通過刊登）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f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Li Hsiao-ting

When Hsü Shen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25-220A.D.) compiled the *Shuo-wen chieh-tzu*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he became the forerunner of a long Chinese tradition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continued into the Ch'ien-lung and Chia-ch'ing reigns of the Ch'ing dynasty. Both *Shuo-wen chieh-tzu* scholarship and bronze inscription (*Chin-wen*) scholarship were unrivalled until the end of the Ch'ing dynasty. When the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s were discovered in large numbers, scholars built on the achievements of *Shuo-wen* and bronze inscription scholars of previous dynasties, creating a new synthesis and yielding outstanding results that can be said to have been without precedent. In the 2,000 years since Hsü Shen, almost all scholars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learned from his methods. Through detailed and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character radicals it has been possible to read and explicate most characters in oracle bones,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small seal" (*hsiao-chuan*) characters. Today, if scholars continue to tread along this path, there is little room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When, in 1968, the author planned to discus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he tried to delineate the detailed and careful achievements of previous scholars. Taking a panoramic approach and employing materials on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different dynasties,

he systematically describ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Certain specialized articles written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have been collected in a small volume entitled *Collected Writing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n-tzu de yuan-shih yü yen-pien lun-ts'ung*).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briefly describe the contents and thought processes behind each of these articles. The author's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thus als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llected Writings*.